

“近平同志对我做人做事影响至深”

——习近平在厦门（五）



采访对象：王太兴，1954年12月生，福建厦门人。1984年8月起到厦门市政府办公室工作，1988年3月任湖里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2002年9月任湖里区教育局局长，2007年4月任湖里区科技局局长。2015年退休。

采访组：沈凌 路也 胥晴

采访日期：2017年6月2日

采访地点：厦门宾馆

采访组：王局长您好，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时您是他的秘书，请介绍一下您到他身边工作的过程。

王太兴：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1985年6月，市政府办公室主任林义恭同志通知我，近平同志即将来厦门担任副市长，让我做他的秘书。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看《毛泽东选集》里有关西北战场的文章总提到习仲勋同志，而我知道习老是近平同志的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好像书本上的人和事一下子走到我身边，感到有些不可思议。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刚刚到市政府办公室工作还不满一年，就能成为近平同志的秘书，确实没有想到。那个时候不能说心里没有忐忑，但还是很有信心地接受了组织上交给我的这项光荣任务。

我当秘书那一年，不到31岁，近平同志比我大一岁。他来厦门报到那一天，我见到他时，看他脸微微有点红。他告诉我：“今天我过生日，喝了一点酒。”我这才知道，那一天刚好是他的生日。一开始，他住在厦门宾馆，后来搬去了图强路。以后每年到他生日这一天，我们几个人就会买点菜，到他家里做点饭，聚一下，为他庆祝生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给您留下怎样的印象？

王太兴：我感觉他是一个很平民化的领导干部，没什么架子，很平易近人，也很贴近老百姓，是一个亲民的副市长。

工作中，他很注重深入群众开展调研。特别是他来厦门第一年，对这里的情况不是太熟悉，工作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了调研上。第二年工作逐渐上了轨道，接手分管更多的部门，任务也逐渐加重，

去现场协调的次数多了起来，到基层调研的时间才相对少了一些。近平同志在厦门开展的调研活动非常广泛，工业、农业、乡镇企业、民政、部队、乡村他都去过。当年亚洲湾大酒店所在地还是一个坑道，是对台前线，我曾经陪近平同志去这个前线坑道开展过调研。

当时交通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他对道路也不熟悉，为了开展调研，他还专门购买了一辆厦门自行车厂生产的“武夷”牌自行车，由他骑车带着我，到社区街道或者工厂去调研。在调研过程中，他也和普通老百姓一样，一坐下来，就把烟递过去，沟通一下感情，然后才进入正题。别人泡的茶，他也不管卫生不卫生，该喝的就喝。厦门的夏天比较闷热，群众看他工作辛苦，给他切一个西瓜，他也不管周围苍蝇围着嗡嗡飞，接过来就吃。近平同志没一点儿架子，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个从京城里出来的高干子弟。

近平同志语言很亲切，让人听着很舒服，就像毛主席说的“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他会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并根据说话对象调整自己的语言风格。场合需要的时候，他会引经据典。但平时跟群众以及跟我们工作人员在一起交流，他都是用贴近群众的朴素语言来交谈。

记得他刚来那一年，因为厦门岛内很多地方毁林采石，导致环境被破坏，开山后的石块大面积裸露，就好像一块块伤疤一样。当时的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也是我们厦门的老书记陆自奋同志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着急，就在1985年底召集市人大、市政府的有关部门去现场调研，近平同志当时作为副市长也跟着一起去了。现场调研后，在1986年1月10

日召开的厦门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近平同志讲了话，既讲了人大如何来监督环境保护，也讲了政府如何主动接受监督。他说，非常感谢与会同志提出的许多宝贵意见。这些意见对政府改进各方面的工作，改进工作方法、工作作风，都有很大帮助。过去主动提请市人大审议的事项几乎没有，这点以后确实应改正。今后凡是法定要提请市人大审议的，再也不能不送或者忘了送。有些还应该主动地、积极地和人大通气、协商，欢迎进一步监督，更加全面地监督。他的这些话都讲到了与会人员的坎里，大家觉得他说得很中肯，听着心里很舒服。

他不仅在工作中平易近人，在生活中也是如此。在厦门工作期间，经常有同学好友来看望他。那个年代，厦门宾馆很少，只有厦门宾馆和鹭江宾馆这么两个，住宿比较紧张。近平同志经常让来厦门看望他的这些朋友住在自己家里。如果朋友想住宾馆，他都是自己来解决，从来不让公家买单。

采访组：请您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在厦门担任副市长期间，是如何开展各项工作的。

王太兴：近平同志在厦门期间担任副市长，他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没有越过权限，同时又有自己的创见，在职责范围内尽力发挥自身的才智和作用。

那时候，厦门刚刚成为特区，大家都一心一意发展工业、发展经济，市政府领导暂时没有安排专人分管农业。80年代我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是农业发展最好的时期，近平同志当时就在市委常委会上主动请缨，提出他来分管农业。后来，他在厦门开展农业调研，推动了“三农”工作，得到广

大农村干部的认可和支持。

当时近平同志经常和我讨论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他从不人云亦云，对工作往往有独到的理解、独到的想法。有一次，我们聊到在中国当时经济形势下，工农业生产的“剪刀差”不断扩大的问题。近平同志认为，应该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增强城市的综合能力，抑制“剪刀差”的继续扩大。现在来看，我们做到了第三、第二产业反哺农业，已经实现了近平同志当年的设想，已很少再提剪刀差了。但在当时，他的这种想法很超前，所以让我很震撼，说明他不仅关心广大农民的疾苦，也很有战略思维，那时候就能够从国家层面考虑问题。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时，您与他在工作上、生活上都有很多接触，他的为人处世和工作方法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王太兴：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时，我在他身边服务，有幸亲眼目睹了他的工作和生活，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刻在我的脑子里，对我做人做事影响至深，也奠定了我以后的人生走向。

我是在近平同志关心下，于1987年12月12日入党的。受他的熏陶，我始终坚守对党的忠诚信仰，任何时候都没有发生动摇。

近平同志做事有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极为认真，从不敷衍塞责、马虎怠慢，更不空喊口号、说说而已。他做事之前一般都要做一些调研工作，提前想好能不能干，一旦决定了就一定要做好。这一点让我很受教育，也培养了我扎实细致的工作作风。

记得1987年初，市里在厦门宾馆会议厅第一次召开领导干部述职大会。那阵子近平同志工作特别繁忙，第二天就要述职了，他还没来得及写述职报告。头天晚上，他忙完工作，已经晚上10点了，把我叫到他家，由他口授，我用纸笔快速记录，就这样整理出一篇7000多字的述职报告。记得当时到凌晨两三点的时候，我实在坚持不住了，总犯困打盹，但他的精力却很充沛，将自己分管的计委、农委、体改委、协作办、民政局、市外办等各项工作，一条一条如数家珍地口授出来。写完以后，第二天他就拿着这份报告去述职，效果非常好。我想，如果不是平时工作扎实，有足够的积累，是很难做到对工作各个方面了如指掌的，也不可能用一个晚上就信手拈来，把那么多内容的述职报告整理出来。

近平同志总是坚持调研先行。1987年，市里开会讨论企业发行股票的事，他在会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说：“这个事情现在不应该急着做，更不能盲目做，要进行充分的调研，论证清楚之后再做。”他的建议得到了与

会同志的赞同，厦门企业1990年才开始发行第一支股票。事情一旦经过了充分的调研，他就大胆去干，从不畏首畏尾。从制定《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到为居委会干部提高工资待遇，都是在充分调研之后作出的正确决策。

近平同志严于律己，当时他工资都由我保管，从中开支，每个月除去买书、洗衣服、伙食费，还有看望老同志的费用，剩下的钱月底我再交给他。他自己从不铺张浪费，钱都用在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开销上。他从来不跑不送，每次外出开会，会议间隙的多数时间是呆在房间里看书，从未借机拜访组织部或者相应主管局的领导，疏通关系。但在送礼这事上他也有例外，就是对待老干部。有一次，叶剑英同志的参谋、毛主席转战陕北时的“活地图”雷英夫中将来到厦门，近平同志就叮嘱我买点厦门特产——香蕉，去宾馆看望这位老同志。

近平同志不仅自己不送礼，也从不收礼。别人知道他的脾气，也不敢给他送东西。有一次，他在梁家河插队时的队长带了几罐自己腌制的桃子到厦门来看望他，近平同志说：“你们来就好了，还带这些干什么，快拿回去。”

正是在近平同志影响下，我后来不论在什么岗位上工作，都一直自觉遵守干部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对钱财物从不动心，从不利用公款交朋友、拉关系、搞小圈子。当时还有人说什么必这样，好像我这样做就不正常的似的。正是受近平同志的影响，我才有勇气和底气坚持这样做，没有随大流跟着走。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厦门后，您和他还有联系吗？

王太兴：1987年，我到新成立的湖里区担任办公室副主任。这个区刚成立，各方面工作都还没上轨道，近平同志希望我去啃这个“硬骨头”。后来，他离开宁德到福州工作期间，我去看望过他一次。那一次刚好赶上福州下暴雨，他在布置工作，我就在他办公室坐着等他。在那短短半个小时里，他先后给10个县委书记打了电话，叮嘱大家一定要去防汛一线察看汛情。后来他担任省委副书记时，我也去过两次。他很关心地问我工作上顺不顺利？有没有什么困难？我说：“没有，就是来看看你。”

随着近平同志后来工作越来越忙，我与他的联系也逐渐少了，但他的言传身教影响了我后半生，对我的政治信仰、工作作风乃至为人处世都起到了导航作用。这些年，我一直秉承着近平同志的教导做事。现在，我虽然退休了，但今后仍然要按近平同志的要求做人做事。

（上接1版头条）

有关新中国政权在制度选择上的坚定性。制度选择上的坚定性，是毛泽东要表达的一个主题，也就是要表达共产党人的制度自信。毛泽东的回答非常清楚，中国共产党所要建立的国家政权的性质，就是“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我们的制度选择，是在这样的国体下确定的，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要建立的，就是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回应那些“外国反动派”所诬称中共所要建立的制度为“你们独裁”时，毛泽东干脆利落地说：“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他坦言，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人民民主独裁”，“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这一回答，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在制度设计上的高度自信。他特别强调了这一制度对反动派“实行专政，实行独裁”，而“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的内容，讲清了什么是“人民民主专政”。这样的制度，与那些“骂我们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的制度恰恰相反。这种在制度选择上的坚定性，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深刻把握和创新发展，是毛泽东在制度问题上高度自信的表现。

有关新中国政权的人民性。中国共产党所要建立的政权的人民性，是毛泽东特别要表达的观点。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人民立场是其根本的政治立场，为人民服务是根本宗旨。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通篇充满着人民立场和人情情怀，明确而深刻地回答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人民的问题，也清晰地告诉世人这个政权如何对待反动阶级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毛泽东还深刻阐释了“人民”的概念：“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特别区分了人民民主的政权对待人民和对待反动派截然不同的态度，“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毛泽东还反复提到了中国人民特别是“一般平民”的概念，指出“反革命专政”一直以来对“一般平民”的压迫，“到现在才为我们领导的中国平民所推翻”。毛泽东所表达的这种人民立场，以及人民意识、平民意识，恰恰是由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宗旨决定的。

善于总结经验是我们党高度自信的表现

毛泽东特别看重“转变关头（哪怕是暂时的局部的转变）”的“历史经验”。他还专门提到过，善于总结经验，是我们党自信的表现，“对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对当前的形势和前途都有明确的认识，因此

我们有巩固的信心”。善于深入总结历史经验并自信规划未来，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启的一个优良传统，也是这个党每到重大历史关头的一项重要举措。

我们党通过总结经验和提出新的主张，向世人讲清楚了自己及其领导的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前进方向。正如胡乔木在回忆毛泽东写作《论人民民主专政》时所说的：“这是基本问题，必须讲清。讲清就有主动权，否则就没有主动权，没有道理好讲。”

我们党通过总结经验和提出一些基本要求，表达出了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进一步强化了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的开头处所点明的，共产党人有“自己的历史使命”，要实现“人类进步的远景”。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毛泽东进一步告诫全党同志：“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我们党通过总结经验和深入思考，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到一个又一个新的理论境界，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构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得到了一个又一个创造性发展。

每到重要的历史节点，为了更好地前进，开创社会历史发展的新局面，中国共产党总要回望已经走过的路，总结党的光辉历程和取得的宝贵经验，提出继续前进的思想主张和政策举措。这是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不断走向伟大的一个重要法宝。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局局长、研究员）

（上接1版二条）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发展定位，建设“四个一”。“一个中心”建设：支持澳门把“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中，打造更多独具澳门特色的高水平、国际化休闲旅游产品，使澳门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要旅游目的地。促进“一个中心”建设与珠海横琴国际休闲旅游岛建设协同发展，形成叠加效应，共建“一体化”国际旅游市场，做大做强旅游产业。“一个平台”建设：发挥澳门联系葡语国家的优势，建设“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国外企业“引进来”的“跨境桥梁”。“一个基地”建设：发挥澳门中西文化交流的纽带作用，建设“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澳门故事”。“一个走廊”建设：运用在澳门设立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澳门高校研发项目，探讨澳门与珠海横琴产学研深度融合合作途径，并吸引国际科技人才和科研成果，努力将澳门建设成为珠江西岸科技创新基地。

发展壮大爱国爱澳力量，巩固

爱国爱澳政治基础。爱国爱澳力量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保持特区长期繁荣稳定的政治基础。只有根基牢固，“一国两制”实践才能走稳、走实、走远。发展壮大爱国爱澳力量，是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必须始终高举爱国爱澳的旗帜，加强爱国爱澳旗帜下的团结包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支持特区加强公职人员队伍的国情研修，持续提升公职人员忠于国家、忠于特区的意识和情感，进一步尊重和认同党的领导地位和国家主体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支持广大澳门同胞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国家和特区事务，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以建设性态度共同为特区发展献计出力。支持特区政府深入做好社会各界团结工作，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支持特区政府和各方面爱国爱澳力量共同关心支持青年一代的培养，关心他们的所盼所求，引导他们增强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为他们的成长成才和事业发展创造机会、搭建平台，努力实现爱国爱澳光荣传统薪火相传、“一国两制”事业后继有人。

（作者系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研究室主任）